



陈晓维 著

好书之徒



好书之徒

陈晓维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好书之徒/陈晓维著. - 北京:中华书局,2012.8
ISBN 978 - 7 - 101 - 08623 - 2

I . 好… II . 陈… III .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9444 号

书 名 好书之徒
著 者 陈晓维
责任编辑 朱 玲 李世文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9½ 插页 8 字数 150 千字
印 数 1 ~ 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8623 - 2
定 价 34.00 元

序

谢其章

晓维出生的一九七三年，我人在青海。这是非常沮丧的一年，想干临时工四处碰壁，想落户口希望渺茫，想得到一块半钢手表最终还是离开青海之后一年才如愿。青海的记忆，心底的沉疴，我不记得那一年有笑容。那一年的日记我抄了许多伤感的句子，“没有可怜我的人/也没有爱惜我的人/没有人听见我的叹声/也没有人啊，可诉说我的伤心”（高尔基）。

三十年后，我认识了晓维，他那一年才跨进收集旧书的门槛，却仍旧赶上了好光景，人又非常聪明，不像我们总是有个买垃圾的初级阶段，他一起步买的货色，即出手不凡，吓人一跳（布衣书局帖子《高卧东山所藏新文学版本二十美》为

证)。我和晓维算是半个同道,可是我的经济远不如他。好几年前,止庵先生光临寒舍,临了,甩了一句话“老谢是穷藏书家”,我说“藏书家”不配,穷倒是实情。淘买旧书,过去多少还有个眼高眼低、运气好坏的因素,现在则多是真刀真枪的拼财政。黄裳说过,买好书只有一途,出大价钱。现状是,晓维的财力在我辈之上,而于晓维之上,之上上者,如过江之鲫,亿元时代突至,总有收不起买不动的时候。

此时的晓维,不单只是一门心思收书,他也开始写书了,边藏边写,能够化解“收不起买不动”的苦恼。我跟帖祝贺晓维“藏书是软道理,写书是硬道理,只藏不写没道理”。才写了两年工夫,晓维就出书了,他又赶上了好光景。更叫人心理不平衡的是,第一本书就赶上老字号名牌子的中华书局。书名“好书之徒”更是奇思妙想,与当下之阅读品味再投缘不过了。我说过,现在来看,“七〇后”最是适宜,早几年太过穷困,晚几年又缺乏苦难经历;七〇后,没耽搁正规教育,又没误了创业挣较多的钱。

晓维写的这种文字,不大好归类,有一点书话的元素,有一点随笔的风致,有一点考据的艰涩,有一点收藏的趣味。我当然能看出来,每篇文章的背后都戳着一件晓维得意的收

藏品，藏品是文字的出发点，亦是支点，即如一向所说的“由此说开去”也。我很早就看破，董桥前台的身份是散文家，后台的底子是收藏家。内地的散文家写不过老董，差距就在于不事集藏，“人无癖，不可交，以其无深情也”，不是说着玩的。

当代人玩旧书，先得把网络玩转，化国界为乌有，缩万里至咫尺。且看晓维这两个例子——“回到家里，我上网找到了唐弢写的一篇莎士比亚故乡访问记。文章里说那次旅行，给他做向导的是牛津大学的刘陶陶女士。刘陶陶，正是刘荣恩的女儿。我又登录牛津大学的网站查到刘陶陶的邮箱，她是牛津东方学院的教师，讲授中国古典诗歌、中国现代文学，现在已经退休。我立即给她发了电子邮件，邮件里附上了《刘荣恩诗集》的书影”。

更有甚者，足不出户，域外购书，——“〇六、〇七年旧书书价大涨，用信用卡在境外网站购书的风气也随之星火燎原。我托在美国谋职的锡象熏斋代为购得《白金汉所藏中国铜器图录》(*Chinese Bronzes from the Buckingham Collection*)。此书是陈梦家四十年代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到芝加哥大学讲学期间所编，扉页上有陈梦家用钢笔题写的赠言。这部书的出版估计为陈梦家筹得不少稿费，否则他回国

之后，收购明式家具难有那样的大气魄。书并不算稀见，但梦家手迹难得，又有朋友代购的辛苦蕴含其间，也着实让我兴奋了一阵子，多次请出来向人献宝”。英美两大国伺候着他一人，这不老舍《茶馆》里的那句台词么。

我也在网络上买书，但只限于国内的几家网站，没有使过任何信用卡，用的是工行银联卡，一分钱也不能透支，每天往外划款不能超过五百元，最近买了本“大几千”的旧书，一连着划了六天。老话“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成想，日落西山的旧书业在这与时代接了轨。

我大略统计了晓维这几十件藏品的来源，有好几种渠道，拍卖会（“上周又去杭州的西泠拍卖凑了热闹”）、书贩送货上门或直接到书贩家（“我也忘不了买到《鸦片战争文学集》的那个下午。二〇〇五年的夏秋之交，阳光很足。我到东郊一个年轻的书友家里看书。他家是单元房，面积不大，却收拾得一尘不染，利利索索，就像他本人一样。他站上凳子从大衣柜顶上搬下来几只纸箱子。纸箱子在我面前一一打开，里面每一本都是整齐干净的旧平装，都是经过这个有心人精挑细选的。阿英签名的这部书就在其中”）、书友转让、网购（“促使我把这册书从书架里找出来读一遍的动因，

是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买的一份朱维基亲笔写的《自述》”。惟独没有一件像我辈似的遛冷摊淘来的。所以我说过，买旧书也有贵贱之分，逛地摊撞大运盼拣漏是“穷法子”，虽然貌似优哉游哉一派逸致闲情，骨子里却透着寒酸相，买不起必被看不起，天经地义。

我找遍全书，没有一处提及藏品的具体价钱，这倒是与时尚不符，与阿英、唐弢那一辈藏家风度，却不谋而合。书话文章，对于价钱，一向是说小不说大，这倒不全是怕被人讥笑炫富夸强的心理，总归有一丝俗念阻挡。其实把书价如实道来，为社会经济史留一点资料，很有用处的。常任侠搜求周作人旧版书，一笔一笔均记有价钱，今天读起来，平添了多少情趣。本书有一处提到的一本珍本书，其售价我问过卖家，他说“大几千”，我说这大几千到底是几千啊，他说“三四千”，原来我对旧书业的行话，这么无知。

晓维的爱买旧书，眼光却并不局限在旧版书上边，资料性很强的旧文档，他也狠下手；文人信札，他还是狠下手。如果成本核算的话，本书所得之稿酬必不抵本书所购之资料费。丁景唐曾说：“早在六十年代初，上海市出版局曾规定上海旧书店，应该首先供应上海鲁迅纪念馆各种鲁迅文物和著

译版本”。如今这套行政规定早就被市场经济冲垮了，北京鲁迅博物馆也照样得在拍卖会上边，与个人买家竞投“鲁迅文物和著译版本”，没有一点儿优先权，优越感也随之消亡。同样的现象同样的道理，公家单位或改制或解体，大量文档资料被处理，泥沙俱下地流散到像潘家园、报国寺这样的旧货市场，最终演变为一个个拣漏与暴富的传奇故事。晓维对于这些文档所持的态度，没有一丝拣漏心理，也不指它发财，我认为他热衷的还是利用资料，查证引据，最终目的是完成一个伤感的故事。

俞平伯说：“序跋之类既异峻刻之批评，又非浮滥之赞誉，必语无溢美，方推合作。”我从未给谁的书写过序，几年前倒是给一家民间刊物写过一个“发刊辞”，幸好刊物胎死腹中，丑未献成。今晓维命我写，我不得不写。正好借好书之徒，浇自家胸中之块垒。

目 录

序	谢其章	1
聂崇岐与翦伯赞		1
南星和王辛笛的晚年交往		13
贺天健与《学画山水过程自述》.....		28
于莲客		41
《琉璃厂史话》漫谈		50
陈梦家的书		58
查显琳诗集《上元月》.....		69
薄英,充和,桃花鱼		79
袁水拍的诗		91
高善必来中国		101
阿英书痕		110
梁宗岱著作两种		121

失去的微笑	130
旧京过客张屏之	138
商务印书馆旧档漫谈之一 ——涵芬楼影印《正统道藏》二三事	146
商务印书馆旧档漫谈之二 ——《邵亭书画经眼录》的第五种版本	159
可堪白头张公子	175
《谢辰生先生往来书札》杂记	183
李平心之死	190
莫道他年事——关于胡云翼	214
祭祀天神者走向天神	223
周子美与泽存书库	233
朱维基译《道生小说集》	242
中秋涉江人	252
《刘荣恩诗集》	263
红旗广场	271

聂崇岐与翦伯赞

聂崇岐这个名字，不研究历史的大概都没听说过。我要不是恰好碰上一些与其相关的资料，也不会知道他。

聂崇岐，字筱珊，天津蓟县人，一九〇三年生。一九二一年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三十年代开始留校工作，追随恩师洪业，在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的引得编纂处担任事实上的负责人。编引得(index)的工作他一干就是二十年，很多学者对他这一时期的工作成果评价极高。我于学术完全外行，但总感觉编引得应该是一项为他人作嫁衣的苦功，想必相当枯燥、寂寞。从一搜即得的电脑时代看过去，这项工作就更如同愚公移山，悲壮而徒劳。今时今日，编引得的学者就像排字工、箍桶匠、敲钟人一样，已经进入历史了吧。他编

的那些大套引得，是否永远也不会再版了？解放初，院系调整，教会办的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并入北大、清华和北师大，聂崇岐也随之被调到中科院近代史所任工具书组组长，参与点校了《资治通鉴》、《宋史》，编纂了《捻军》、《中外历史年表》等资料书。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七日他因心脏病去世，据说去世前半小时还在伏案工作。

二〇〇七年夏天，我在一朋友家里见到几份聂崇岐编引得的手稿。当时我一脑袋生意经，嫌聂崇岐这名声生僻，手稿上又没有署名，就没要。第二年秋天，大老板杜国立在布衣书局网站上开贴兜售一批聂崇岐自存的平装书，我赶紧开车到他家里把这批东西拉走了。这里面，除了洪业、朱士嘉等人的赠书外，主要是聂崇岐亲自参与编纂、校对的著作，如《中外历史年表》、《史记》、《捻军》等。聂崇岐有在自己所编书的空白页记录出书经过的习惯。他在《捻军》第一册的环衬用毛笔写的题记最有意思，兹抄录如下：

一九五〇年夏，齐致中约翦伯赞先生便饭，邀余作陪。饭后闲谈，翦先生谓计划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怂恿致中及余分任“鸦片战争”及“捻军”二题。余于秋初

开始蒐录，至一九五二年初，大致完成。会三反运动起，工作停顿。至夏初，又着手整理、标点、编排，每通宵从事，至十一月全部交由中国史学会转上海神州国光社承印。一九五三年一月，开始校对印样，至三月底，全部竣事。故此书之成，自始至终，皆出余一人之手。

方稿之交出也，翦先生谓余在三反中成为重点，单独署名不甚宜，且此种资料丛书亦无只用一人名义者（实则白寿彝编回军起义，即由其一人出名，余虽知之，未当面点破翦先生所云之不合实情），因建议署名由范文澜先生领衔，翦居其次，余列第三。又嘱推荐二人以凑成五人之数。余当时以许大龄、陈仲夫二名应命。孰知翦先生未用许陈，改以其助手林树惠、王其集二人充选。于是此书编者项下遂居然有五人矣。

一九五八年五月，历史三所开批判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大会。中间休息时，范先生语余，此后《捻军》再版，可将未参加工作者名字剔去，只由余一人出名，以便名实相符。余以此书已重印三次，若干以后重印时编者一项，由五人变为一人，无乃不着痕迹，因婉言向范先生谢绝。故于一九五九年第四次重印时，编者项下，一仍旧

贯，未予改动也。

据段君昌同言，当此书署名之补充二人也，翦先生向其助手五人说和，嗣乃决定用林王二人。段君当时颇不以此种做法为然。呜呼！义利之不明久矣，彼寝馈儒经者尚难辨此，又何责于今之人哉？

筱珊 一九五八，六，五

这段题跋，可以当一篇短文来读。聂崇岐先说明此书之成完全是一己之力，然后转入与翦伯赞谈话一幕。我在此对时代背景略作说明：一九五二年一月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单位立即按照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校长陆志韦成为主要斗争对象。聂崇岐与沈迺璋（心理系主任）、齐思和（历史系主任）、陈芳芝（政治系主任）等四人作为陆志韦包庇重用的“骂人团”，亦受到波及（这四人被称为“四兄妹”，罪名之一是谩骂当时比较进步的教授为不学无术的“真空管”、投机分子）。在一次揭发控诉陆志韦罪行的大会上，陆志韦的女儿陆瑶华上台控诉了自己的父亲。

西语系教授巫宁坤当时刚从美国回来不久，目击了聂崇

岐“在三反运动中成为重点”。在他九十年代赴美定居后所写的回忆录《一滴泪》中有这样一段：“在文学院的一次批判会上，历史系和中文系的十位教授和讲师被指控组织‘十人团’反动小集团。原来他们不时聚餐清谈，三杯下肚不免发发牢骚，讽刺时政。他们必须在会上从实交代，互相检举。有中文系学生揭发，其中一位讲师出过一个作文题目‘从猿到人，从人到？’，这个学生愤怒地质问他是何居心。这位讲师吓得面无人色，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头求饶。主持会议的党员又指责他斯文扫地。历史系著名的聂教授‘态度恶劣，对抗运动’，立即‘隔离反省，交代问题’。后来我在校园里碰见过他的家属，手里提着饭盒去禁闭室给他送饭。”

巫文中的聂教授即指聂崇岐。聂解放前先是在美国人办的哈佛燕京学社做事，后转入中法汉学研究所，一九四八年八月又到哈佛大学东方语文系讲过几个月的中国史部目录学，二十年职业生涯一直跟资本主义国家脱不了干系，加上他为人耿直，成为众矢之的理所当然。

翦伯赞则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他当时在燕京大学以“党外布尔什维克”面目示人，实际上早在一九三七年就入了党。翦伯赞作为燕京大学意识形态上的领袖人物，

人称“新燕京摄政王”，是党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一座策略性的桥梁。翦先生把聂教授找来，先一针见血地点出聂在三反运动中的不利处境，一句话先把聂摁在椅子上，使其在谈话中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然后再提出署名问题。对于范文澜和翦伯赞列名在前，聂崇岐当时就明白已是无可奈何之事，只能接受。但他没想到让自己另外推荐两个人挂名，也完全是走个形式，作个姿态。聂教授不识时务，认为既然事已至此，肥水不流外人田，遂把自己赏识的学生许大龄报上去。聂崇岐报上来的两个名字从翦先生左耳朵进，马上就溜出右耳朵。最后意外列名的林树惠、王其渠，前者是翦的助手，后者则是他的私人秘书。王其渠是翦伯赞的湖南同乡，还是诗人昌耀的五叔。土改时，王其渠曾力劝昌耀的父亲王其桂到公安局自首，交待清楚历史问题。

著作的署名就是对作者劳动成果的认可，每个作者都会非常在意，聂崇岐对此事难以释怀并不奇怪。他在另一本著作《中外历史年表》的题跋里，也对署名问题发了一顿牢骚。他说：“此书下力最多者为余，次为刘君，次为齐君，翦则总其成者……旋又争名次前后，翦先生与刘固旧交也，意存偏袒。”《中外历史年表》一书最后署名的顺序是：齐思和、刘启